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五編 第十四冊

金初漢族士人的政治參與

陳昭揚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14 冊

金初漢族士人的政治參與

陳 昭 揚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金初漢族士人的政治參與／陳昭揚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序 2+ 目 2+178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編；第 14 冊）

ISBN：978-986-254-427-3（精裝）

1. 政治參與 2. 漢族 3. 金史

618

100000585

ISBN-978-986-254-427-3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 編 第十四冊

ISBN：978-986-254-427-3

金初漢族士人的政治參與

作 者 陳昭揚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初 版 2011 年 3 月

定 價 五編 32 冊（精裝）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金初漢族士人的政治參與

陳昭揚 著

作者簡介

陳昭揚，台灣台南人，1972年出生，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金史，主要關懷課題為士人活動與政治制度。

提 要

十二世紀初，以完顏部為首的氏族聯盟在完顏阿骨打的領導下，在統一了原先各自為政的女真族落後，隨即以不及掩耳之勢南下滅遼破宋，建立此後金朝在淮河以北百餘年的統治。為求擴大政權規模並鞏固其生存基礎，此時金朝不斷吸納各族各類的人才，而漢族士人正是金朝極力爭取的對象之一。是以有關漢族士人與金朝如何在政治面向中結合的探討，可說是金初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書主要探討金代太祖至熙宗年間，漢族進士進入金朝的背景與過程，以及入金之後的相關政治活動。書中以金初兩大漢族士人群體——遼系與宋系漢族士人為主體，分別論述了其入金歷程與入金後的參政行為及態度，同時也分析了當時遼、宋、金三國的待士政策與國際情勢的變動對這兩大漢族士人群體入金參政的影響。

自序

本書原為筆者就讀於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文中主要以漢族士人為主角，觀察他們在遼、宋、金三國角力下的出處進退之道。當年選題之際，學界雖多遼、宋、金之際的研究成果，不過以士人為主體的研究尚少，也罕見探討漢族士人對於當下時局的思考，及此一思考與其政治行為的關係，這便是本文最初欲以漢族士人為觀察重點的原因之一。進而本文的最初設定不但欲以漢族士人為主角，更有意將這批亂世的漂流者還原為常人。所謂之「還原為常人」，簡單而言，便是試著落實闡述這些士人的成就與當代時局的互動歷程，將他們的活動均視為各式環境的牽動所致。也許是這種設定，加上相較於一般的漢人王朝時期，這批漢族士人在此時的活動空間也確實受到極大的壓縮，由今所見，本文對於人物的描述基調竟是頗為黯沈，總見強調這批士人的無力與無奈，他們雖然曾有積極改造未來的意圖，但是時勢流轉卻將他們最終的抉擇與作為逼入一處他們主觀想法上無意也不願的處境當中。現在看來，這種看法應是低估了這批漢族士人對當時局勢的影響力道與自身的主動性，畢竟即便個別士人確實頗難與大環境抗衡，但是士人群體對於社會、政治、文化等各類議題上的共識與努力，卻也使他們完成了遠超過自身當下期望的歷史成就。

除了解決研究者自身的好奇外，研究成果也須提供學界助益，因此除了透過論述抒發研究者對於關注主題的懷想外，論述的價值也須以能否補充學界之不足，或是能否糾改過去誤解為衡量標準。由於這篇論文是筆者的初習之作，無論是分析或敘述均屬見青澀，重新瀏覽，所謂助益云云，實深感惶恐。不過本文處理的幾個課題，仍有部分至今尚為學界未見深論之處，尤其

是關於齊國立廢對宋士入金的影響，目前似僅有外山軍治〈金朝的華北統治與傀儡國家〉曾論，如此則或仍有刊行價值。同時，本文也有部分論述需要修正與補充，例如遼系漢族士人政治力量的衰退，本文承襲當時學界說法而以田穀黨禍爲其大舉退出金朝政壇的轉折時間點，但是目前所見，恐怕直至世宗朝結束爲止，遼系漢士仍然能與宋系士人勉強抗衡，對此筆者後於〈金代漢族士人的地域分佈——以政治參與爲中心的考察〉一文曾有辨明。另外又如金初科舉的興辦詳情與作用，本文所論甚簡，對此筆者後於博士論文《征服王朝下的士人——金代漢族士人的政治、社會、文化論析》中亦有補充分析。

本文的完成，受到指導教授王明蓀老師極大的鼓勵與指導，亦在論文口試時獲趙振績與蕭啓慶兩位老師的糾謬提點。不過也必須坦承，當時諸位師長所揭示的問題，至今仍有不少猶爲筆者所努力思考而未能利用此次出版機會全面修訂改寫，也因此本書所論當有許多仍值商榷之處，此還望讀者諒察並賜教指正。

陳昭揚 序於 2010 年冬



目

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遼系漢族士人的入金	7
第一節 宋金間的抉擇	7
第二節 金朝的遼系漢士引用政策	21
第三章 宋系漢族士人的入金	31
第一節 宋士與金朝的初次接觸	31
第二節 齊國的建立對宋士的影響	44
第三節 齊廢之後——金朝與宋士關係的再建立	51
第四章 漢族士人入金後的政治活動	65
第一節 遼系漢族士人入金後的政治作為	65
第二節 宋士的參政的挫折	79
第三節 漢族士人參政的合理化	92
第五章 結 論	107
附 表	113
表一 遼系漢人入金過程一覽表	113
表二 宋系漢士入金經過一覽表	117
表三 宋系漢士仕齊經過一覽表	122
表四 金初宋朝遣金使者一覽表（太祖至海陵王時期）	124
表五 金初金朝遣宋使者一覽表（太祖至海陵王時期）	131
表六 金初金朝遣宋使者族屬表（太祖至海陵王時期）	136
表七 金初科舉年表（太宗至海陵王年間）	137
表八 金初進士榜（太宗至海陵王時期）	139
徵引書目	143
附錄 金代漢族士人的地域分布——以政治參與為中心的考察	147

第一章 緒 論

十二世紀初，以完顏部爲首的氏族聯盟在完顏阿骨打的領導下，藉由其父祖數代經營的根基，統一了原先各自爲政的女真族落。西元 1114 年（遼天慶四年）九月，由於不堪遼朝的賦役需索，完顏阿骨打帶領著女真族人正式挑戰遼朝，進而於 1115 年正月稱帝，國號「金」，隨即以破竹之勢南下滅遼破宋，建立金朝此後在淮河以北百餘年的統治。在這兵馬倥傯、戰火四起的時代，金朝不斷地吸納各族各類的人才，以期擴大政權規模並鞏固其生存基礎。此時，漢族士人正是金朝極力爭取的對象之一。是以有關漢族士人與金朝如何在政治面向中產生結合關係的探討，可說是研究金初歷史發展的重要課題。

對於此一結合，我們至少需要從兩個觀察點切入思考。首先，金朝究竟是透過哪些政策來吸引，或強迫漢族士人加入。漢族士人的存在本外於女真政權，金初所要引用的漢族士人全是來自遼朝與宋朝，而遼朝與宋朝此刻卻是金朝的敵國，如何從敵國陣營吸收這批漢族士人，抑或是在攻下遼宋舊地之後，如何「馴服」這些新附地區的漢族士人，對金朝而言正是項重要而又未曾面對過的任務。關於這段時期金朝引用遼、宋漢士的政策，無疑是金朝能夠在燕雲及華北地區站穩腳步的重要關鍵。

第二個問題是漢族士人參與金朝的過程爲何，期間是否存在著「階段性」發展，這個問題包括了漢族士人如何加入金朝政權，以及漢族士人內在認同與外在活動之間的落差與調和。對漢族士人而言，入金仕宦並非僅是異地仕宦，在由異朝入仕金朝的過程中，他們除了必須適應不同的政治體制外，還需要重新調整政治認同的對象。尤其是對由宋入金的漢士而言，這種適應與調整過程是一種艱苦的折磨，而對這種折磨的反思也將是我們今日回首理解

當時漢族士人心靈活動的重要關鍵。

透過這兩個角度的觀察，我們才有把握探討此時漢族士人與金朝關係的建立，其中發展的意義所在。由於以往的學界研究未見能夠全面檢討此一課題，對此進行整理與分析便為研究金初歷史一項亟待處理的工作。過去的中國歷史研究中，相對於其他朝代，金代的研究頗為稀少，遑論金初種種。進而就已有學界成果所見，金初歷史多半是以宋金關係與女真部族的社會習俗作為討論主軸。當然也有部份成果已經涉及本文即將要探討的內容，以下將對此簡單整理。

目前的金史研究多存在於臺灣、中國、美國、日本等四地，如果單就整體金朝漢族士人的政治活動來觀察，則研究成果多出現於中國與美國。在中國方面，有關金初漢族士人與金朝之間互動的研究，較值得注意的有何俊哲〈論十二世紀初年燕京地區官僚豪強在宋、遼、金角逐中的作用〉、都興智〈金初女真人與遼宋儒士〉、宋德金〈金代女真的漢化、封建化與漢族士人的歷史作用〉等三篇。其中何文詳細整理了十二世紀初遼系漢族士人與當時歷史局勢演變的互動，指出遼系漢士於遼、宋、金三國交鋒期間具有關鍵性的作用。〔註1〕都氏一文則以金朝對遼宋漢士的政策作為討論主軸，說明金朝爭取漢士加入的過程。〔註2〕宋文是針對漢族士人在女真民族漢化及封建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討論，探討層面較廣，論述時間則含金朝全期。〔註3〕除上述直接相關於本文討論的三文外，尚有不少間接涉及本文探討重點的成果，如金初政治制度、宋金關係的探討等，唯此論述眾多，便不多贅言介紹。

美國漢學界中，金代漢族士人的政治思考是近年頗為熱門的研究領域，已有不少學者參與，而Peter K. Bol（包弼德）為代表。在此領域中，美國漢學家多半是從比較宋遼、金、元士人活動的角度觀察金代漢族士人活動的特殊性。所論頗為宏觀，也提供我們進一步細察此一課題的基礎。進而美國學界的討論，具體成果乃以華裔學人，尤其是陳學霖與陶晉生兩位先生的貢獻較大。陳學霖之成就在於說明了漢族士人是如何幫助金朝建構其統治思想的

〔註1〕 何俊哲〈論十二世紀初年燕京地區官僚豪強在宋、遼、金角逐中的作用〉，《遼金史論集》第5輯（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頁255～269。

〔註2〕 都興智〈金初女真人與遼宋儒士〉，《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1年6期，頁70～75。

〔註3〕 宋德金〈金代女真的漢化、封建化與漢族士人的歷史作用〉，《宋遼金史論叢》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315～325。

架構，尤其是「正統論」的討論，代表著作有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Jurchen-Chin Dynasty*。陶晉生則更不待言，自〈金代的政治結構〉、〈金代的政治衝突〉至其博士論文 *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A Study in Sinicization*（之後陶氏又加以補充，並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即《女真史論》）與後來的幾篇論文中，陶氏以多年研究建立了金朝政治運作模式的討論架構。於〈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文中，陶氏更是全面揭示了金朝漢族士人的活動基調。

不過整體而言，目前學界對於金初漢族士人的政治活動仍有不足，但因此時之漢士活動乃為後來漢士與金朝關係建立的奠基期，於是強化此一課題的觀察或有必要。在此動機上，以下將試著探討金初漢族士人的政治參與。在討論前，在此先設定本文所要論述的範圍。第一、全文的討論時間將置於金初時期，即自收國元年（1115年）金太祖建國起，至皇統九年（1149年）熙宗被殺之間的35年間。以此時為討論重點的主要原因，乃是此時正為第一代入金的漢族士人活躍於金朝政壇的時刻。相較於未曾出仕「異朝」的第二代漢士，第一代漢士均是來自遼、宋等曾經或正在與金敵對的政權，大部份都有出仕「異朝」、「敵國」的經歷。雖然一般學者，尤其是文學研究者，多將「金初時期」斷限至正隆六年（1161年）海陵王被殺為止。（註4）但因本文所處理的對象，即第一代漢族士人，至海陵王時期多已凋零，而此時政壇上較有影響力的漢族士人如蔡松年、胡礪等人，其政治生涯多為入金之後才得開展，嚴格說來已經不屬標準的第一代漢士，所以本文遂放棄一般學界合論熙宗海陵王時期的習慣，僅以1149年以前的漢士活動為主要論述重點。不過如有必要，亦會略論海陵王時期的漢士活動。第二，討論人物主要將是女真統治階層與漢族士人。進而為免議題蔓衍過廣，本文僅論出仕金朝的漢族士人，至於因拒仕金朝而隱逸不出，甚至組織義軍抗金的漢族士人，則待來日再論。第三，觀察焦點將置於兩方面，一是理解金朝政府漢族士人政策的制訂及實施過程對漢族士人加入金朝的影響，二是注意金朝漢族士人在加入金朝的前後，其政治認同與從政態度上的變化。

〔註4〕研究金代文學史的學者為研究方便，多將金朝歷史分為初期、中期、晚期等三期做討論。中晚期之斷限雖然各家多有爭議，但初期將之界定於正隆六年為止則是一般的公論。參見胡幼峰《金詩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8年）第三章第二節〈金詩的分期〉中的論述，其中可見如許文玉、蘇雪林等學者均如是主張。另外詹杭倫雖將金朝文學發展分為五期，但第一期亦止於正隆末年，見氏著《金代文學史》（台北：貫雅文化，1993年）〈引文〉，頁5。

進一步，我們也有必要檢討金初「漢族士人」的身份界定。首先，爲了資料處理上的方便，本文所謂「士人」的定義將盡量寬鬆，原因主要是此時的史料並無法提供我們對當時出現的各式人物進行嚴格的身份判定。對此，本文將借引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一書對「士大夫」的界定，書中作者認爲「士大夫」乃指「一切已出仕和未出仕的讀書人」。^{〔註5〕}於是我們便不強求此人必爲某科登第才算「士人」，更不以其言行舉止是否合乎中國傳統對士人的界定才將之列入討論。^{〔註6〕}在此僅以該人具有「詩文背景」，即在史料中曾經出現有詩文之創作、論著之傳世、或學習經籍典禮等記載，便認定該人具備士人身分。經由這項界定，我們才能整理出足夠的資料釐清在此亂世之際，這群曾經接受傳統中國知識訓練的「讀書人」是如何面對他們這段時期的經歷。

再者，漢族身份之界定亦爲一項困難的工作。這牽涉到兩個問題，第一是這批士人的血統狀況究竟是否能讓他們被稱爲是「漢族士人」，第二是這批士人本身是否意識到自己是漢族士人。這兩個問題，尤其在我們思考遼系漢族士人的國家認同時實難以避免。然而要討論有關漢族身份的認定也是件相當吃力的事，直至今日，這類問題的認定與思考，不僅是歷史學者，也是社會人類學家一項極大的挑戰。^{〔註7〕}但因資料過少，我們只能暫且擱置遼系漢族士人對於自我族屬認知的全面分析，而僅在相關記錄已能提供局部觀察的情形下簡單的討論。至於宋系漢士，由於他們與過去的士人均呈現著相同的政治思考模式，且在所見資料中，宋系漢士也似乎並未懷疑自己的族群取向，

〔註5〕 此項定義引自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頁2~3。該書所論乃是明末（1628至1662年）士大夫的殉國情形及明清時期士大夫對於上述殉國者的意見，書中何氏便具體指出所謂「已出仕和未出仕的讀書人」，「前者包括各級在任、停職及致仕等官員；後者包括已取得進士銜而仍未授職的士人、其他具有科舉頭銜的士人（如舉人、生員）、國子監和地方庠序的學生，以及一般布衣之士。」

〔註6〕 如書儀在《元代文人心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年）中，便以「具有專門的『知識』，並且以某種知識技能作爲自己的專業和謀生手段的人」、「這些人還應該表現爲在某種程度上關懷著社會理想，以及自身基本價值的實現」等兩項條件界定他所認知的「文人」。（見書前「幾點說明」頁1~2）其中第二項可說是界定文人或士人相當嚴格的條件。由於金初漢士活動記載的漏簡，難以確認當時人物是否真爲「某種程度上關懷著社會理想」，故本文不擬採此觀點。

〔註7〕 社會人類學的討論，關於「中國人」、「漢人」的概念界定，詳參王明珂《華夏邊緣》（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

其身份似少可議之處。於是關於「漢族士人」的身份界定，本文均以過去研究為基礎，首先以前朝背景為依據，即出身於宋朝的士人均視為漢族出身，除非他們具有明顯的非漢族血緣背景且足以影響到他們日後對出仕政權的判斷；在遼系士人方面，則以其姓氏、族系兩項條件作為判定標準，若姓氏為漢姓者，只要史料並未明白指出他們曾有非漢族的先世背景，則均視為漢人。

最後，金初活動於金朝政府中的漢族士人，絕大多數均來自遼、宋兩地，本文將之定名為「遼系漢族士人」與「宋系漢族士人」。^{〔註8〕}這兩類士人由於入金時間及雙方出身條件的差異，致使入金後的參政活動各具特色，因此有必要將之區隔分論。但須注意的是，金初漢士雖因地域出身而有此兩類「群體」的出現，但是他們卻未必因此結黨組派並藉此分別「我類」與「他群」，此點我們在第四章第三節將有論述。這種分類在當時除了有金朝政府在官員銓敘的作用外，對這兩類士人的交往，無論是日常生活或是政治活動上，似乎無法構成明確而直接的影響。以上是討論之前須先說明者。

女真統治階層及漢族士人之間的互動將是本文處理的焦點所在。但另一處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恐怕是在宋遼金三國更迭競爭之際，漢族士人將如何安排他們的出處，進而成就自己的歷史形象。雖然此時的漢族士人並非全然沒有左右世局的能力，然而他們在多數時間中卻連自保都是極為困難。多數的漢族士人非但無法維持最低的生活條件，有時甚至連深藏於內心的道德價值都要被迫不斷地被提出批判、改造。關於中國古代文人在生命中必須面臨到的矛盾，有學者曾道：

古代中國文人總是處於種種矛盾的夾縫之中，一輩子在仕與隱、君與親、忠與孝、名節與生命、生前與身後等問題上痛苦地煎熬。這種痛苦與矛盾的文化性格，來自於中國傳統文化心理，也與複雜的社會環境有關。^{〔註9〕}

〔註8〕「遼系漢士」與「宋系漢士」的命名乃參考陶晉生先生的分類而得。在陶氏〈金代的政治衝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1分，1971年，頁135～161）中，曾以「燕人」及「南人」分別兩者。（其分類尚包含非士人身份者）而〈金代的中國知識份子〉（《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頁981～994）一文中，陶氏則稱來自北宋的士人為「北宋系士人」（頁983）。為求敘述方便，在此姑且將此兩組漢人群體名為「遼系漢士」與「宋系漢士」。最後，理論上漢族士人也能來自党項夏、高麗等遼宋以外政權，但史料未見，故可不論。

〔註9〕參見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鄧紹基序中所引之么書儀的書信內容，頁1。

這是么書儀從元代文人事蹟的研究中所得的感受。這種矛盾，正也展現在十二世紀初期士人在亂世之中的無奈。政治環境的轉換，使漢族士人被迫面臨政治認同與價值觀的錯亂，尤其在統治政權的更替中，漢族士人究竟要顧全身家性命而強迫自己改變政治效忠的對象，還是要依循傳統儒家學說對忠節的講求，選擇放棄榮華富貴甚至是以一己或親朋的性命換取自己對此一信念的堅持，這均是此時士人所無法迴避的兩難糾葛。另一方面，多數士人則在避免極端的考慮中，盡力思求一能夠兼顧人情義理又能苟全於亂世的兩全之道。在理念與現實的琢磨間，這段時期的士人遂以各式作為在這些矛盾的縫隙中掙扎。

由於金初史料的貧瘠，欲爬梳整理漢族士人心靈活動，總難免出現過度推論之嫌。金初的歷史研究基本上是以《金史》、《大金國志》、《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遼史》與《宋史》等史料為主。^{〔註10〕}這幾部史著中，《三朝北盟會編》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均為當代實錄，但因記事者為宋人，其敘事角度及史料選裁上頗不利於以仕金漢士的角度進行觀察。而元修三史又因距離已遠與裁減修飾，金初漢族士人的活動情形記載有限。至於《大金國志》關於金初漢士的記載則更是缺乏，且訛誤甚多。此外，可資利用的史料尚有金人文集（含後人輯編者）與當時宋人的文集筆記，前者有《金文雅》、《金文最》、《九金人集》、《中州集》、《全金元詞》、《全金詩》等，其中《金文雅》、《金文最》與《九金人集》三部由於收錄之金初詩文數量不多，故在此則以《中州集》、《全金元詞》、《全金詩》等三種史料作為討論金初漢士心態層面的主要依據。至於宋人的文集小說，問題同於《三朝北盟會編》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但其中卻也有不少言外之意足堪玩味。以上大致是本文在討論之前，對可供利用的史料所做的整理與理解。

本文將以入金時間的先後分別敘述遼系漢士與宋系漢士的仕金經歷。第二章將從金朝收納遼系漢士的政策整理遼系漢士的入金過程，並探討遼系漢士是如何以選擇仕金作為最後依歸。第三章則討論宋士入金的過程，說明宋士是在哪些歷史條件中入金並出任任官。第四章則檢視漢族士人加入金朝後的政治活動，且因當時之宋系士人詩文現存較為豐富，因此將嘗試由這些詩文進一步掌握宋士入金後的感受，說明入金出仕的選擇對宋士在政治思考上的影響。

〔註10〕 史料版本，詳見書末「徵引書目」。

第二章 遼系漢族士人的入金

第一節 宋金間的抉擇

在入金前，遼系漢人已在遼朝的統治下生活百餘年，在這段時間中，遼地漢人適應了在所謂「異族政權」下的生活。並且因為與遼國境內各民族的接觸，遼國中的漢人與非漢民族間逐漸在生活習俗乃至於整體文化上，產生出「涵化」(acculturation)的現象。^{〔註1〕}但是，文化的融合現象卻無法令我們據此確認遼系漢人已經在政治上成功與遼朝契丹統治階層結成一體，尤其是遼朝末年，當遼國在女真的攻擊下岌岌可危之際，遼系漢族士人的出處更可說明這個現象。

遼末時期，在遼系漢人的政治認同現象上，有兩個現象甚值得我們注意。第一，雖然他們在遼朝統治期間，表面上看起來已經認同了遼朝的統治，但在遼朝採取了因俗而治，即所謂「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註2〕}的政策下，致使遼朝中的契丹統治階層與漢人之間依舊保持著政治權力的分配不均等問題，這造成遼系漢人與契丹統治階層之間的貌合神離。這種現象在遼朝政權穩固的時候並不會對雙方產生太大的影響，但在遼朝末年動盪的局勢之下，則嚴重地衝擊了遼系漢士對遼朝的效忠。

〔註1〕所謂「涵化」(acculturation)，乃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立文化因為彼此接觸而相互產生文化變遷的現象。遼朝漢人的文化與生活，詳參 Wittfogel, Karl A. & Feng Chia-Sheng (馮家昇),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pp. 213~225。

〔註2〕語見《遼史》卷45〈百官志〉，頁685。

第二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是遼系漢人在遼朝的統治之下，逐漸因為生活環境的類似而產生了休戚與共的觀念。換言之，因為遼朝境內的漢人多生活在燕雲地區，而當地的漢人社會在遼朝的統治下，透過了婚配、交際等各項人際活動形成了一個半封閉的社會結構。在這個社會結構中，遼系漢人，至少是燕雲地區的遼系漢人，彼此的價值理念逐漸被整合與強化。如此，一個半獨立的「命運共同體」遂被製造而出，而這個群體的代言人則由其中有著更多機會接觸政治的遼系漢士所擔任。

由於這些背景，面對遼朝末年的局勢，遼系漢士遂有其特殊的因應之道。首先，遼朝中的漢族官員擁有比契丹族官員更開闊的空間得以思考他們的政治前途。此刻遼系漢士對於他們的前途不外有三種選擇，即存遼、入宋或是降金。但事實上選擇存遼一途的遼系漢士，其實也僅是努力於遼亡之前。在遼亡後，這批漢士更並未在延續遼朝政權一事上的表現出有如宋系漢士效忠宋朝般的堅持，這從遼朝滅亡之後遼系漢士轉投宋、金的「流暢」可以得知。況且，至少就今日可見的史料來看，並沒有看到有關遼系漢士做出情願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來效忠遼朝的記載。至於此時韓昉的努力折衝於遼宋之間，〔註3〕或如其他漢族官員曾經為遼朝力守城池，其實也都無法表示遼系漢士對遼朝的忠心，因為這些作為最多不過是遼系漢士忠於職守的表現，並非是忠於遼朝。〔註4〕由此可見前述所言的排擠效應，確實是明顯地表現在遼系漢士在遼末阨陞之際不願挺身而出盡節於遼朝的現象上，而使遼系漢人竟得「燕人自古忠直者鮮」〔註5〕

〔註3〕 天輔六年（宋宣和四年，1122年），韓昉曾與契丹人蕭容代表遼朝入宋造訪童貫、蔡攸，企圖以納款稱臣的方式阻止宋朝與金國的聯兵。參見《三朝北盟會編》卷10，頁1～2。

〔註4〕 觀察遼系漢族士人在遼末的作為，我們可以注意到遼系官員如果盡心於他們職務的表現時，似乎並非是單純來自於「忠遼之心」所致。倘若我們將此時部份遼系漢士之無視金軍強大，而仍堅守遼朝所授職務的狀況，認為便是遼系漢士忠於遼朝的表現，那我們就很難解釋何以一旦金軍攻破城池，稍早堅守城池的遼系漢士即迅速選擇效忠金朝，而未見選擇退隱甚或殉國以報遼恩的現象。如韓昉在遼亡前夕仍猶汲汲為遼奔走遼宋之間，待為金收用後，卻又安於金朝所授與他的任務。可以推測的是，這批遼官此時之堅守崗位，很可能只是基於他們盡心於職務的責任感。而這種「責任感」，在今日的說法即是所謂的「職業道德」，並無關於其對遼朝的忠心程度。是以所謂「忠於職守」及「忠於遼朝」這兩個概念，在此似乎有分開討論的必要。

〔註5〕 語出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金世宗所言，全文為「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金史》卷8〈世宗本紀下〉，頁184。

的臭名。換言之，如果考量遼朝終將滅亡，則遼系漢士的抉擇恐怕就只有入宋及降金二途。

另一方面，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由於燕雲地區漢人社會中人際關係的緊密，使得當地大部份的漢族士人，在擁有比其他身份的百姓更具有接觸政治的機會下，必須負起顧及燕雲地區漢人群體利益的責任。他們在處理政治前途的選擇時，便難以僅就自己的需要考量自身的出處。於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遼系漢士遂在遼末遼宋金三國交鋒之間跳脫出既定的政權效忠模式，既不強求為遼朝盡節，也不以身為漢族而堅持依附宋朝。他們的唯一顧慮，就是如何在考慮自己政治前途的同時，能夠兼顧整個燕雲漢人社會的權益。也因此，在遼宋金三國為了爭取燕雲之地而做努力時，對遼系漢士而言，佐遼、入宋或仕金的關鍵，就在於這三個政權何者能給他們最大的利益。所以，遼系漢族士人對於存遼、入宋或是仕金，最初當無定見。

在天輔六年（遼保大二年，1122 年）金朝尚未攻下遼國的漢人聚居區域之前，罕見遼系漢士入金。（詳情見後）但因金國兵威甚銳，除了部份仍猶汲汲努力於遼朝的未來外，已有不少遼系漢士漸興思遷之念。而投宋一途，無疑極為誘人。一方面是宋朝在南方立國甚久，其國勢及文明之盛均對遼系漢士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再者遼系漢士自也深知宋朝對於收回燕雲地區尚抱持著強烈的意願。前者成為遼系漢士選擇投宋的誘因，後者則促成了宋朝的配合。其中最早發難的遼系漢士，當屬馬植。關於馬植入宋時間，目前尚多爭議，但至少不晚於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金收國元年，1115 年）。〔註 6〕此外，馬植入宋也非其個人行為，在《三朝北盟會編》卷 8 中，已經入宋而改名為趙良嗣的馬植，在向童貫說明約結當時在遼朝太尉李處溫的可靠性時，曾道：「良嗣舊在大遼，與處溫結莫逆交，後論及天祚失德事，欲與良嗣同約南奔，嘗於北極廟拈香為盟，欲共圖滅契丹。」〔註 7〕另外在《宋史》所收之通宋書信中，馬植便言自己曾在遼朝與李處溫之子李奭、族兄馬柔吉、豪士劉範三人「結義同心，欲拔幽薊歸朝」。〔註 8〕由此，馬植入宋似非個人行為。而當李處溫在遼的結宋事蹟敗洩時，史料亦有傳遵說、趙履仁、劉耀齋等漢

〔註 6〕關於馬植入宋時間，參見何俊哲〈論十二世紀初年燕京地區官僚豪強在宋、遼、金角逐中的作用〉，頁 256 至 267 的討論。

〔註 7〕《三朝北盟會編》卷 8，頁 9。

〔註 8〕《宋史》卷 472〈姦臣二·趙良嗣傳〉，頁 13734。